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新时代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提供了根本遵循。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十四个坚持”中的第二个坚持是“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这是党的领导的最高原则,也是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重大建党原则。这条重大原则既是我们党不断成功的一条根本经验,也是新征程上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的坚实保障。系统把握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科学内涵、理论渊源、历史现实逻辑以及制度实践机制,对于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高度实践性和系统性的政治原则

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不是抽象的政治口号,而是一套具有严密逻辑、体用贯通的现代国家治理科学系统。在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整体框架中,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呈现出高度的原则性与系统性。

政治定位的“最高性”与“唯一性”。在《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增强推进党的政治建设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党的领导,最根本的是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的系统集成。“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统领全局、定盘导航的“体”,展现出根本的前提地位与政治定力;而“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等具体部署,则是高效落地、付诸实践的“用”。无“体”,则无“用”。如果没有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这一根本之“体”提供政治定力和最高权威,所有具体的制度安排、行政工具和组织体系等“用”的层面就会失去中心,沦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无法凝聚起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磅礴合力。正是由于“体”的坚固确立,才保障各项治理工具之“用”的顺畅运转,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坚强保证。

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标识性的重大科学论断

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作为党的领导的最高原则,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史上有着深厚的理论根基。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全面从严治党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领导是全面的、系统的、整体的,必须全面、系统、整体加以落实。”这一重要论断从根本上划定了全党各个层级、国家各个机构、社会各个领域,都必须在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言论、政治行为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这一党的领导的最高原则的科学内涵,体现了治理要素的整体性。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不是局部的领导,而是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在横向结构上,它涵盖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把所有国家治理要素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下,避免部门之间的条块分割与职能推诿;在纵向结构上,它具备直

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

达基层的穿透力,使党中央的战略意志能够毫无阻碍地穿透层层组织体系,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

体系维度的“体用贯通”。在《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党的领导,最根本的是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的系统集成。“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统领全局、定盘导航的“体”,展现出根本的前提地位与政治定力;而“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等具体部署,则是高效落地、付诸实践的“用”。无“体”,则无“用”。如果没有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这一根本之“体”提供政治定力和最高权威,所有具体的制度安排、行政工具和组织体系等“用”的层面就会失去中心,沦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无法凝聚起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磅礴合力。正是由于“体”的坚固确立,才保障各项治理工具之“用”的顺畅运转,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坚强保证。

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标识性的重大科学论断

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作为党的领导的最高原则,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史上有着深厚的理论根基。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全面从严治党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实践,赋予这一原则以新的科学内涵和制度形态,实现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创新。

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守正创新。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具备坚强的集中统一领导,是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核心原理。恩格斯在《论权威》中深刻论证了权威与服从是从任何社会组织机器高效运转的客观规律,认为缺乏必然的权威,任何复杂的现代社会大生产都将难以继为。他在总结巴黎公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刻论证了权威对于无产阶级政党的极端重要性。列宁在领导俄国革命实践中,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集中和权威的思想创造性地发展为系统的民主集中制

原则。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对经典马克思主义领导原理和组织原理的继承和发展。

构建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原理性成果。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民主集中制和党的自我革命的科学应用,是构建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原理性成果,蕴含着深刻的学理创新。从民主集中制的科学视角审视,集中是以民主为基础和前提的正确集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民主集中制“把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和正确实行集中有机结合起来,既可以最大限度激发全党创造活力,又可以统一全党思想和行动,有效防止和克服议而不决、决而不行的分散主义”。这种建立在民主集中制基础上的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能有效激发全党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通过清晰的战略统筹推动整个组织体制的效能释放。依靠党的自我革命探索出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成功路径,其学理底蕴正在于: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能够通过高度集中统一的制度化内部约束,构建起内生性的自我革命机制,实现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良性循环,这为推动人类政治文明发展作出了中国贡献。

超大型国家治理和实现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必然选择

从历史的纵深发展和现实的宏大时代背景审视,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中国近代以来治理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更是在政治制度上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必然要求,体现了历史必然性与制度优越性的统一。

对历史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中国作为一个拥有超大地域规模、超大人口体量、复杂内部结构的超大型国家,近代以来的历史反复证明:一旦中央权威旁落,国家陷入地方本位主义和多头政治内耗,社会就会走向四分五裂,甚至沦为西方列强宰制的对象。新时代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维护党中央

权威,决不是一般问题和个人的事,而是方向性、原则性问题,是党性,是大局,关系党、民族、国家前途命运。”新时代对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强调,正是对正反面历史镜鉴的深刻总结。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生命力,恰恰取决于在历史波涛中能否始终团结在坚强的党中央周围,严守保持步调一致的政治纪律。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带领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根本在于建立了一个能够如臂使指、具有钢铁意志的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中枢,这是历史的选择,也是保持中华民族凝聚力的重要前提。

破解大国治理难题的“最大确定性”。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可靠保证。当前,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各种矛盾叠加,变乱相互交织。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成功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矛盾,更加彰显了“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有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和战略统筹,我们就能够不惧任何惊涛骇浪的考验。而且,这也能够有效降低大国治理的“成本”,确保国家重大战略能够统一推进、协同发力,实现“乘数效应”。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确保国家长治久安的定海神针。对比西方多党制在选举驱手下频繁“翻烧饼”,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构成了国家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政治软件”与制度内核,确保了国家中长期规划能够做到跨越数代人而久久为功,有利于确保超长期战略的连续性,这正是现代国家能力构建的最核心要素之一。

从制度规范与体系重塑上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

在《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二卷《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重大建党原则》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首先要落实到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上,落实到增强‘四个意识’、坚

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的实际行动上。”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必须依托严密的组织架构和制度网络,转化为看得见、管得住的制度规范和体系。

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在体制上的巩固,是一个连续且不断深化的过程,主要是健全党中央对重大工作的领导体制。通过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进一步完善了党中央对重大工作的领导体制,形成了统一高效的领导体制,把党的全面领导贯彻落实到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确保党中央总揽全局、协调各方。

建立健全制度体系,为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提供制度保障。确保在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需要通过一系列重要制度安排,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例如,根据党中央有关规定,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党组成员,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每年向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书面述职;完善推动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实机制,建立完善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的任务分工、督促检查、情况通报、监督问责等制度机制,通过建立定期就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和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情况“回头看”和报告、通报制度等,确保党中央政令畅通、令行禁止;严格执行重大事项请示报告制度,按规定及时向党中央报送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的进展情况、工作成效和存在的问题;等等。

将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转化为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澎湃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强化制度执行力,加强制度执行的监督,切实把我

国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将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政治优势转化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需要多方面系统推进与贯彻落实。

聚焦“国之大者”,强化重大战略部署的推进力。把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全面落实到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打赢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等关系长远发展的重大决策中,从而在大国博弈中赢得主动和优势。各级党组织要及时对标对表,及时校准偏差,更加坚决有力地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切实将各地方、各部门的行动统一到全国一盘棋中,在行动上破除战略执行中的条块分割与政策虚化。

贯通纵横网络,激发基层组织的治理活力。把党的全面领导有效嵌入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新就业群体以及广大城乡基层社区治理中,不允许出现党的领导弱化、虚化、淡化和边缘化的情况。通过破除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为基层赋能减负,畅通民主沟通与诉求表达渠道,将顶层设计的原则性与基层治理的灵活性有机耦合,把党的组织优势转化为基层社会治理的强大力量。

优化选任考评,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现代化干部队伍。干部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的重要因素。必须通过严格的思想政治、政治历练、实践锻炼、专业训练,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持续优化干部选拔任用和考核评价机制,推动广大干部将对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政治忠诚,转化为有效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的担当能力。旗帜鲜明地为敢抓敢管、不折不扣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的干部撑腰鼓劲。同时,铁腕纠治在部分领域存在的“躺平不作为”“盲目机械跟风”等倾向,确保我们党庞大组织肌体中的每一个细胞都能在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下创造性地开展工作。

我们已经走过千山万水,还要继续跋山涉水。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征程绝不会是轻轻松松、一帆风顺的,唯有以政治上的绝对清醒、思想上的凝心铸魂、组织上的钢铁凝聚、行动上的步调一致,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把坚定拥护“两个确立”的政治要求转化为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行动自觉,才能真正将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政治优势、制度优势转化为全党一致前行的磅礴力量,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航船劈波斩浪,无往而不胜。

(作者为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副院长)

构建中国工商管理学自主知识体系的着力点

王永贵 马 双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表明,社会大变革的时代,一定是哲学社会科学大发展的时代。”改革开放后特别是新时代以来,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中,一批中国企业在治理变革、科技创新、全球竞争中展现出卓越的管理智慧,中国工商管理学在与国际理论交流互鉴中加快发展。深刻把握我们当前具备的突出制度优势、坚实实践基础、深厚文化底蕴和充分理论自觉,对于加快构建中国工商管理学自主知识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构建中国工商管理学自主知识体系是理论和实践创新的必然要求

企业是经济运行的微观组织。工商管理学以这些微观经济组织的管理活动及其运行规律为研究对象。作为一门理论与实践联系极为紧密的学科,工商管理学在微观层面揭示企业资源配置、价值创造与组织治理的运行机制,指导企业经营实践,优化产品和服务供给,提升创新创造能力,培育经营主体核心竞争力,最终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在宏观层面通过提炼微观经济组织的实践经验与规律性认识,为产业转型升级、经济高质量发展 and 国家战略实施提供学理支撑。

改革开放后,我国工商管理学在扎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实践中发展壮大。

我国国有企业改革持续深化,民营经济蓬勃发展。这一进程推动我国企业在技术、管理等方面走向自主创新,催生出大量植根我国制度、产业与文化土壤的管理实践。比如,国有企业将党建融入企业治理,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承

担重大战略任务中展现出独特优势;政府与企业协同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形成了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的治理格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赋能管理创新,催生了以义取利、和合共生的人文管理理念。这些实践创新,既运用了具有普遍性的管理规律,更蕴含着与西方企业显著不同的制度逻辑和文化基因,为我国工商管理理论创新提供了丰厚土壤。在理论上,我国工商管理学在学习、吸收西方工商管理理论的分析工具、研究范式,并将其应用于我国企业经营管理实践的同时,也深刻认识到西方工商管理理论预设深植于资本主义私有制逻辑之上,以股东价值最大化为单一目标,难以解释我国企业面临的诸多独特现象,必须根据我国实际进行理论创新。

任何工商管理理论都是特定历史与实践的产物。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伟大实践中,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的不断完善、世界一流企业的加快建设,决定了我们不能简单套用西方理论,而应基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对中国工商管理实践作出理论总结,加快构建中国工商管理学自主知识体系。

明确中国工商管理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方向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这一重要论断,为构建中国工商管理学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根本指引,明确了前进方向。

扎根本土实践,提炼中国特色管理规律。近年来,我国企业成长迅速,实力更强、结构更优,在全球价值链中正在从过

去单纯的生产者向组织者、品牌商和方案提供者拓展,涌现出一批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企业。特别是以高质量党建推动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混合所有制改革等实践,打破了西方理论中的教条和误区,展现出鲜明中国特色。应坚持“两个结合”,通过总结特征、解释现象、分析成因和发现机理,从我国经济实践与理论探索的良性互动中、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提炼学术范畴和概念,提供更具解释力的分析框架,推出立足中国历史、解读中国实践、回答中国问题的原创性理论成果,健全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

坚持开放包容,破解跨国经营共性难题。随着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我国企业越来越多地将目光投向海外市场,寻求更大发展空间。与此同时,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逆全球化思潮抬头,企业跨国经营面临多重挑战。我国企业顺应经济全球化大势,坚定不移助力发展开放型经济,推动跨文化管理、本地化运营,加强对海外工厂和研发中心的跨国管理,推动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跨国经营体系。总结符合我国企业“走出去”实际的管理战略和管理模式,能够更好地抓住我国企业出海所面临的前所未有的战略机遇期,有效化解“走出去”面临的风险和挑战,为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工商管理学创新发展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國方案。

坚持回馈社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近年来,我国推动将企业社会责任理念融入生产经营全过程,引导企业回报社会,支持企业在乡村全面振兴、社会公益等事业中积极贡献力量。全国工商联发布的《中国民营企业社会责任报告(2025)》显示,截至2024年底,全国共有23.51万家民营企业参与“万企兴万村”行动,产业投资额达1.23万亿元,惠及16.19万个乡村。深刻挖掘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中富民厚生、义利兼顾等观念的重要价值,积极传播中国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理念和经验,能够校准中国工商管理学的价值导向,推动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把握技术变革,开拓理论创新空间。当前,以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物联网、区块链为代表的新一代数字技术加速突破,推动企业的组织结构、运行方式等发生深刻变化,催生出一系列新的管理议题。我国企业敏锐抓住技术变革机遇,根据企业实际、结合市场需要,认真研究制定企业的技术战略、市场战略、经营战略等,加快自身转型升级,积极探索数字经济时代的企业管创新,不断提升自身的研发能力与成果转化应用能力,打造了一批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品牌。高度关注数字技术、数字经济对企业管理的深刻影响,直面新技术挑战推动理论创新,能够引领和推动新技术条件下中国企业的管理创新,并为工商管理学创新发展作出贡献。

聚焦重大问题推进中国工商管理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问题是时代的声音,回答并指导解决问题是理论的根本任务。”在把握方向的基础上,以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为切入点提出科学解释,推出更多具有影响力、说服力的研究成果,是推动构建中国工商管理学自主

知识体系的题中应有之义。

深化对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的研究阐释。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各国现代企业制度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中国市场体系、制度环境以及社会传统文化等国情的中国特色,对于提升现代企业治理能力具有重要意义。既把握现代企业制度一般性理论与实践,又把握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如何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围绕领导体制、产权结构、公司治理、企业创新等维度,进行深入的学理性、系统性阐释,能够实现管理理论和管理模式创新,有效指导中国企业管理实践。

深化对强化企业创新主体作用的研究阐释。企业是创新的主体。当前,我国正在以科技创新为支撑推动高质量发展、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通过提升企业科学管理水平,引导企业科学制定融入和服务高质量发展的战略和规划,能够构筑竞争新优势。围绕如何通过管理创新让企业更好适应新的市场竞争、如何利用新技术支持企业决策和管理进而提高效率 and 效益等问题开展研究,将在推动企业自身不断发展壮大的同时牢牢掌握发展主动权。

深化技术与文化融合催生市场创新的工商管理理论探索。文化具有更深层的力量,能够为管理创新注入持久动力。与西方工商管理理论将文化视为效率工具,以西方文化维度为普适基准不同,中国企业正积极探索依托人工智能和虚拟现实等数字技术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以文化创新反哺产业升级的新经营形态。可围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理念融入企业战略管理与组织文化的制度化路径、民族品牌培育与跨文化传播的管理范式、人工智能驱动的文化创意产业组织形态与价值创造逻辑、全球经营场景下兼容多元文明的跨文化管理理论等深化研究,形成兼具中国气派与国际对话能力的原创工商管理理论。

(作者分别为浙江工商大学校长、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

以金融力量支撑人工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做好科技金融这篇文章,引导金融资本早投、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作为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引擎,人工智能的发展壮大离不开资本的支持,需引导金融活水精准滴灌人工智能。人工智能产业具有轻资产、高投入、长周期、高风险的特征,与传统产业金融服务需求存在显著差异,人工智能大模型和高端芯片研发、核心算法优化,往往需要长期高强度投入,短期内难以产生稳定现金流,单纯依靠企业自有资金和短期流动资金贷款,难以支撑创新突破。目前,金融体系尚存在信贷模式不匹配、长期耐心资本供给不足、多层次资本市场赋能不足等一些结构性问题,难以完全适配人工智能产业发展需求。引导金融活水精准滴灌人工智能,需围绕人工智能全产业链条创新需求,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构建以耐心资本为引领、多元产品为载体、多层次市场为支撑、风险分担机制为保障的全周期金融服务体系。具体来看,要发展壮大长期资本,发挥政府资金的撬动作用,为培育耐心资本营造良好生态;创新金融产品,为人工智能企业提供股权投资、信贷投放、债券融资等一站式综合金融服务;拓宽直接融资渠道,优化企业融资结构;健全风险分担机制,既保障安全又激发活力。

——摘自2026年8月4日《经济日报》,作者:殷成东,原题为《引导金融活水精准滴灌人工智能》

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

论点撷萃